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内涵研究

Lexical Semantics of Verbs in Ancient Chinese

王诚 著

商務印書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内涵研究

Lexical Semantics of Verbs in Ancient Chinese

王 诚 著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内涵研究/王诚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 - 7 - 100 - 15982 - 1

I. ①上… II. ①王… III. ①古汉语—动词—研究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151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内涵研究

王 诚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982 - 1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frac{1}{2}$

定价:4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王 宁

在汉语语言事实基础上,吸收训诂学的研究成果,重建与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是我们这些年的学术追求。王诚的这本书,是这种学术追求的认真践行,他的许多见解,证实了我们的看法,为汉语词汇语义学开出了一条新路。

不论从文化多样性的事实来考虑,还是从双语教学的实践来考虑,各种民族语言的差异性,永远比语言的共同性更为重要。不论是普通语言学还是语言类型学,主要关注的都是世界语言的共同性;但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共性的表现方式永远是个性的。研究自己的母语,重要的是把握它的特性,只有把握特性,才能与语言事实对接,得到的结论才能真正属于这种语言。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语言具有某些类型的共性,或具有普遍的共性,只是说,汉语的研究要从自己的语言事实起步,而不是从比附其他语言的所谓“共性”起步。要在差异中看共通性,所谓“和而不同”,才能还原语言事实。我们的做法应该是,用汉语的事实来验证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以求得对汉语的真切认识,以便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母语,并促进母语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应当是王诚这本书的主要出发点。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这要看跟谁去比,但总有一点是最突出的。F. von 施列格尔在 19 世纪把世界诸语言分为孤立型、黏着型和屈折型三大类型,为了分类的穷尽性,洪堡特把归不进这三类的都归在一起,称为多式综合语。在这个框架下,汉语被界定为孤立语,与越南语、萨摩亚语等语言是一种类型。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普遍的说法,认为孤立语的语法有两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实词通常不带语法标志。第二,句法关系主要靠语序来表明。这两条变成了两个公式,影响了汉语语法研究很多年。但这第二条实际上是不符合汉语事实的。汉语句子的语序不能说完全没有固定的规则,但是语序与句子组合的关系非常松散,不但定语、状语这两个修饰成分放到哪里都能懂,就是主语、宾语和谓语之间的位置关系,出于表达的需

要,受到韵律的冲击,也是说动就动,没有定序的。为了维护强加给汉语的“语序”说,汉语语法不得不把违背那些硬性规定的变通语序称作“修辞”,结果是合乎修辞比合乎语法的实例还要多。出于意义理解的需要,汉语语法于是提出了一个“指向”的术语,其实就是看词和词组在句子里和另外的哪个词发生意义关系。这个提法正是因为汉语的句子成分没有固定的语序,“喝了一杯热热的茶”,“热热地喝了一杯茶”和“喝了一杯茶,热热的”,基本意思没有变化。汉语施受同词,主语和宾语的次序即使颠倒,在语境中也不影响理解。类型学说的第一条倒是千真万确,也很重要。但这并不仅仅是类型学的视角,也不仅仅是语法问题,汉语的词没有语法标志,词进入句子也就没有相应的形态变化。汉语的词法、句法都十分简单,一个词用在句子里功能多途、变化多端,多少规则也管不住,一旦出现了一种可以描写的组合方式,解释的办法最终也只有归到意义上,而语义主要由前后无词缀的单音节语素和词来承负;所以,汉语是一种十分倚重意义的词根语。那么,其他类型的语言用语法形式表示的性、数、格、级、体等语法范畴,汉语又如何表示呢?汉语绝大部分当然也在词根里。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语义必然丰富,体现在哪里?当然还是在词根里。所以研究汉语,不论从哪里起步,最后都需要特别关注词义的内涵。王诚的这部书,选取“语义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冲着汉语最核心的这个特点来的。

汉语以语义为中心,必须首先解决实词的分类问题。有人说,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实词的语法分类,其实,没有词类标记的汉语,实词词类划分从来没有离开过意义。章太炎先生从印度哲学的“六句义”里,取“实、德、业”作为汉语词汇的分类,“实”是事物的本体,“德”是事物的性状,“业”是事物的运动,与“名、形、动”不谋而合。这应当就是汉语词类以语义为标准最顶层的分类。在这个问题上,语义与语法的切合与相通已经得到证实。王诚在他的书里介绍了“实、德、业”的语义分类,也就是语义和语法互相照应的分类,这无疑是对太炎思想的继承。

在三类实词中,研究语义内涵应当从哪一类入手?王诚选择了动词。他在书里引用了多人的成果,阐明了“动词中心说”的原理,显然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语法学把动词作为中心,是因为把谓语看作句子的中心,在多数句子里,动词常常是谓语,名词作为主语、宾语和定语、状语,总是围绕着动词来体现自己的功能,因此,在被认为是黏着语和屈折语的语言中,动词的形态变化也是最多的。在语义学里,动词中心也是有道理的,汉语的名词、形容词都可以用作动词,动词的独立性最强,汉语动词的语义内涵当然也是

最丰富的。王诚的研究以运动动词为中心,遵循中国训诂学的语义中心论原则,从动词的语义中提取时间、空间和角色三类语义因子,探讨了汉语动词的语义内涵。他的研究以西方语言学中的体范畴为参照,考察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的时间内涵;借鉴现代汉语空间系统的研究,考察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的空间内涵;吸取语义角色理论,考察上古汉语动词的语义角色内涵。这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语言学理念,又没有忽略西方理论语言学成果的做法;这是一个把握汉语特点,与国外语言学进行对话的做法。它证明了,时间、空间、角色这样的动词语义要素,在不同的语言里都是有的,但是它们存在的领域和表现的方式完全不同。西方语言的一些语法范畴中的意义,在汉语中是包含在词的语义内涵里的。这部分内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揭示了汉语动词的语义内涵,也同时说明了汉语词汇的另一个特点,汉语词汇意义有隐性的特点,要在语境和构词中才能释放出来。把这些语义的隐性要素发掘出来,对汉语词汇的解释和母语教学,都有重要意义。把汉语词汇的语义因子和西方语言的语法形态等同起来,抄袭西方语言学的语法术语来称谓汉语现象,会丢失汉语语义中的很多信息,无法反映汉语的真实面貌。

王诚的研究要面对汉语动词的再分类,这是许多人想做又很难做到的,他运用了假设演绎法,先提出上古汉语动词分类的假设,在一部分语料初步归纳的基础上,然后通过演绎证实其普遍性。他对动词的时空内涵和角色内涵加以勾稽后,吸收了训诂学分析意义的两分法,通过比较,初步归纳了运动过程完整和运动过程不完整这两类动词,分别描写了二者不同的语义结构。为了避免循环论证,他采取从聚合中归纳语义特征,再到组合中加以验证的做法来进一步证实结论。他秉承章黄之学重视求根的传统,从词源意义中体会语义特征,做得自然,论得到位。读他的文章,也许会感到一些不完善,但也时时会有一些惊喜。

王诚的学习和研究态度正如他的名字,处处看到真诚。他认真去学,不违师承而广泛吸收;他努力思考,想明白一点说一点。他有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从本科就注重根基。他主攻训诂,又有较好的音韵学基础,熟悉上古音,《说文》更是下过功夫。为了多一门语言便于比较,也为了阅读原文书,他辅修了英语。他认真地读过一些普通语言学和国外语言学的书。这些,在他的书里都可以感觉到。这本书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作了不少修改,但是没有离开我们共同学术追求的初衷。

到浙江大学以后,王诚有了一个新的研究汉语词汇学的环境,有了很多能够帮助他的忠于学术、努力进取的老师和伙伴,他很幸运。这本书是他的

一次可贵的尝试,今后的道路还很长。不忘师承,开拓进取,依照章黄“明其理,得其法”的精神,走自主创新之路,本着汉语的特点,用自己的语言学特色和国外语言学平等对话,希望王诚作出新的成绩。

2018.3.18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动词语义研究的取径和方法	4
1. 语义特征分析	5
2. 配价和格语法	6
3. 认知语义研究	7
4.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8
二、古汉语动词语义研究的现状	10
1. 研究现状概述	10
2. 研究案例分析	13
三、本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思路	15
1. 研究对象	15
2. 基本思路	18
四、本书的语料来源和结构安排	20
1. 语料来源	20
2. 结构安排	23
第二章 基于《说文》的上古汉语动词分类	25
第一节 动词的界定和选取	25
一、动词的界定	26
二、动词的选取	27
第二节 《说文》词训系联	30
第三节 动词语义分类概况	34
一、一般运动变化	35
二、涉及身体部位	41
三、其他动作行为	49
第三章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的时间内涵	53
第一节 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	53

一、汉语体范畴研究概述	54
二、位移动词的时间语义特征	57
(一) 位移动词的过程结构	59
(二) 时间特征和情状类型	74
三、动作动词表达行为和结果	78
第二章 动词时间特征与语法研究	87
一、从体的角度看介词“于”	87
(一) 前人研究的检讨	88
(二) 动词和介词“于”的关系	90
二、从时体角度看副词“方”	95
(一) 前人研究的检讨	96
(二) “方”类副词的平行互证	99
第三章 小结	103
第四章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的空间内涵	107
第一节 动词语义和空间位置	108
一、静态与动态	109
二、空间位置关系	113
(一) 空间拓扑关系	113
(二) 空间方位关系	118
第二节 位移动词和运动参照	125
一、自身参照与他物参照	126
(一) “前、进”“退、却”的对称	127
(二) “前、进”“退、却”的不对称	132
二、空间位移的主观参照	135
第三节 动词语义和方向特征	141
一、动词的方向特征	142
(一) 手部动作的方向性	143
(二) 足部动作的方向性	157
(三) 眼部动作的方向性	166
二、方向的对立统一	174
(一) 施受对立统一	174
(二) 内外对立统一	177
(三) 上下对立统一	179
三、动词的方向性分化	183

第四节 小结	188
第五章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的角色内涵	190
第一节 语义角色的相关研究概述	190
一、西方语言学的语义角色理论	190
二、汉语研究中的相关内容简介	191
第二节 动词语义角色与词义研究	193
一、综合性动词和角色隐含	194
(一) 对象角色隐含	195
(二) 工具角色隐含	199
二、语义角色与同义词辨析	204
三、宾语的角色与词义演变	212
第三节 动词语义角色与语法研究	217
一、语义角色与上古汉语作格动词	218
(一) 古汉语作格动词研究述要	218
(二) 作格动词的语义角色分析	220
二、语义角色与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	232
(一) 双及物结构的研究方法概述	233
(二) 双及物动词的语义角色分析	234
第四节 小结	246
第六章 结语	248
参考文献	258
引用书目	262
词语索引	264
后记	266

第一章 緒論

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词汇、句子、篇章等不同层级在内的自然语言的意义。20世纪前期，意义问题被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所忽视，加之语义自身的复杂性，与语音学、语法学等邻近学科相比，语义的研究（特别是词汇语义的研究）处于滞后的状态。从世界范围来看，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在语音方面，20世纪则特别重视对语法的研究，到20世纪后期，语义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结构语义学、生成语义学、功能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等在内的各流派学说日渐活跃。正如王宁（2005）所指出的，“西方结构语言学从语言形式出发，进行普遍句法的描写，在发展比较成熟以后，由于方法论的缺欠，产生了危机，需要增加新的解释机制，语义因素的介入于是成为必然的趋势。”^①

王先生认为，语义学的兴盛是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也是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必然。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学科结构发生变化，语法学打破文字、音韵、训诂的格局得到迅速发展。在语法学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语义的研究却被冷落而停滞不前。在汉语语言学的各个门类中，语义学成为最薄弱的环节。不过，语法研究在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开始关注汉语自身的特点，认识到汉语缺乏典型的语法范畴，对纯粹形式化的句法研究不能适应，在专注于语言形式描写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意义的研究。

因此，不论从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的立场出发，还是从顺应当代语言学发展的趋势考虑，语义研究都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而词是承载语义的基本单位，词汇语义的研究更是亟待加强和深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受苏联语言学的影响，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汉语语义学则未能迅速完善，发展相对落后，“用‘词汇’来代替‘语义’的后

^① 王宁《汉语词汇语义学在训诂学基础上的重建与完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果,便是使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既不确定又不充实,而语义却始终未能作为汉语语言学的重点之一被摆进汉语语言学的体系中去。”^①建立和完善汉语词汇语义学,既是为了适应当今时代实际需要,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固然要借鉴、吸收西方语义学的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更应充分利用传统词义研究的丰富成果,这就离不开训诂学的继承和发扬。

20世纪80年代,在越过四五十年的断裂层之后,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的汉语训诂学得以复苏,并且明确了它在当代汉语语言学学科结构中的位置,王宁(1996)指出“训诂学是语义解释之学,它要寻求语词和语句意义之间的对当关系。在这些关系的寻求中,训诂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略加发掘就可以总结出许多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语义的规律性的原理。训诂家们还提供了大量经过初步整理的语义材料。要丰富中国的汉语语义学,理所应当地要从训诂学中吸取历史的材料。”^②因此,王先生主张汉语词义研究应当在自己的传统中总结,建立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本书以上古汉语动词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动词的语义内涵。吕叔湘(1986)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住。”^③据此可以说,动词是观察语义和语法结合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动词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领域的开垦,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和吸收,动词研究的角度更加多元,涉及的层面更为丰富,该领域也不断生发出新的研究增长点,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尽管有观点认为,印欧语以动词为主,而汉语则以名词为主,动词在孤立语中远不如在形态语中那么重要^④,但必须承认的是,任何语言都有名词和动词这两种词类,动词包含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在句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各类语言的共性。^⑤上古汉语也以动词和名词的数量为最多,从用例来看,动词所占的比例甚至高于名词^⑥,其重要性不言

^①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8页。

^② 同上。

^③ 吕叔湘《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载《句型和动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年,第1页。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实际已经提出“动词中心说”。

^④ 参看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⑤ 刘丹青提出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动词优先的语言。见《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试说动词型语言和名词型语言的类型差异》,《世界汉语教学》2010年第1期。

^⑥ 基于标注语料库的词汇统计显示,在25部先秦文献语料库中,动词的词例数为346 036,占28.7%,名词的词例数为312 898,占26%,见李斌、冯敏萱、陈小荷《基于标注语料库的先秦汉语词汇统计》,第十三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2012年。

而喻,但和现代汉语动词相比,上古汉语动词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我们发现,已有的古汉语动词研究,多数着眼于语法,对动词语义的关注较少、探讨不够。上古汉语动词是汉语动词的源头,作为汉语词汇语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汉语动词语义这一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上古汉语动词语义研究的重点在于对词义特征、语义内涵的发掘和揭示。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而上古汉语又具有较多的综合性语言的特征,比如缺少形态变化^①和以单音词为主^②,它用相对丰富的词义来弥补自身形态的贫乏。关于分析的语言与综合的语言,萨丕尔解释说,前者“不把概念合并成词,或只很经济地这样做”,而后者“概念比较密集,词的内部间界重重,但是总的说来,有把具体意义归到单词的较小范围内去表达的趋势”。^③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汉语比较接近于综合的语言,集中表现在词义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谓的“综合性动词”。蒋绍愚(1989)指出,“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有一种从‘综合’到‘分析’的趋势”,“所谓从‘综合’到‘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后来变成或是用两个词构成词组,或是分成两个词来表达。”^④杨荣祥(2003)认为,“先秦有一批‘对象自足’动词,这些动词具有综合性特点,后来陆续都向分析性发展。”^⑤胡敕瑞(2005)指出,上古到中古词汇的发展存在从隐含到呈现的规则。^⑥这从历时的角度表明上古汉语单音词概念融合、语义综合的特点,其内含的语义到了中古经由复音化等形式析出,通过语素呈现于外。

语义内涵和结构形式相对应,词汇意义与句法结构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时,形式和意义又是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面,语言分析可以从意义到形式,也可以从形式到意义。我们研究上古汉语动词的着眼点侧重于意义、内涵

^① 商代晚期甲骨文所代表的早期汉语已经演化为音节型语言,声母和韵尾也很难寻觅到代表前后词缀的复辅音明确形式。作为音节型语言,汉语固守音节词的边界,排斥音节词之外的语音附着(包括它的语法负载意义)。参见江荻《音节型语言演化的后果》,《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五卷。

^② 据相关研究统计,西周时期,金文中出现的复音词有435个,约占22%,先秦主要传世文献《左传》《论语》《诗经》《孟子》《公羊传》《穀梁传》《楚辞》《荀子》中的复音词数量达到2772个,也占全部词汇的20%以上。到中古时期,汉语复音词数量则占词汇总数的53.3%。参见江荻《音节型语言演化的后果》,《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五卷。

^③ 参见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4页。

^④ 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2—233页。

^⑤ “所谓综合性,是从后代的语言看,由两个成分的句法结构表示的内容,古代用一个词(一个概念)表示。”见杨荣祥《“太叔完聚”考释》,《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3—134页。

^⑥ 参见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页。

方面,或者说主要的研究进路是从意义到形式。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排斥从形式到意义的研究进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注重考察动词的句法表现及其对词义特征的反映。深层的词义结构难以直接观察,至少现有的分析工具还无法将意义形式化地呈现出来;而句法结构则具有直观的特点,易于形式化,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论证性。因而句法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语义内涵的表层形式和外部证据,更何况内容决定形式的同时,形式也会对内容起反作用^①。我们认为,这两条进路与其说是互斥,毋宁说是互补的关系。对其中一条进路有所侧重,是为了避免陷入循环论证,但也不能否认语义内涵和结构形式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

一、动词语义研究的取径和方法

动词在句法结构中居中心地位,而且动词的数量相对较多,所以是语言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对动词语义的研究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里不可能作全面的梳理和综述,只能就笔者所见闻的、与本书关系比较密切的相关成果,按不同的研究取径和研究方法作简单的介绍,以期对前贤的研究及相关学术史有大致的反映。另外,在本书的相应章节中还会就动词语义研究的某些方面作专题性的综述,比如第三章对汉语动词体范畴研究以及句法—语义界面研究中的体界面假设和体分析法的集中概述,又如散见于第四章各小节的对汉语空间问题研究的简介,再如第五章对西方语言学的语义角色理论的专节综述,以及对作格动词和双及物结构研究状况的专题介绍。

不同语言、不同时代的动词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就共通性这一方面而言,现代汉语动词的研究和西方语义学的动词研究,可以作为上古汉语动词研究的借镜,但另一方面,汉语有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殊性,上古汉语动词也有其区别于现代汉语动词的个性,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有所差别。虽然动词语义的研究已有不少的成果,但在上古汉语领域,相关的研究尚不多见,研究的方法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这里主要介绍现代汉语

^① 比如,认知语法就对语法形式(包括词语形式和句法形式)颇为重视。构式语法认为,“动词的意义本身不完全支配动词的句法表现,任何动词出现在某种句法框架的可能,取决于动词的词汇语义和相关语法构式的独立语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见潘秋平《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0页。

的相关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学界重视引进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广泛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西方结构主义的形式化描写需要增加新的解释机制,语义因素的介入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样道理,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相互渗透、相互验证和相互结合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语义特征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分析、语义指向分析等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从而使动词语义得到较多的关注,而方兴未艾的认知语义学和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更是为汉语动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领域。

1. 语义特征分析

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是一个词语在意义上区别于其他相关词语的特点。语义学中分析和描写词的语义特征主要出于三个目的:一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对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词语作进一步的细致分类;二是对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词语进行比较,突显它们之间的差异;三是区别和辨析同义词或近义词。这个概念后来被语法研究所借用,语法学中所讲的某一类词的语义特征是指这一类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类词的语义成分或者说语义要素。^① 影山太郎认为,探讨这类反映在句法结构上的语义特征,是动词语义学的一个基本内容。^②

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和“台上演着京戏”这两个句子格式完全相同,前者可以变换为“主席团坐在台上”,但不能变换为“主席团正在坐台上”;后者可以变换为“台上正在演着京戏”,但不能变换为“京戏演在台上”。这是因为能进入第一个句子格式的动词具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这类动词还有“站”“蹲”“躺”“贴”“放”“写”“挂”等;而能进入第二个句子格式的动词则不具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语法研究中使

^① 义素分析有时也被称为语义特征分析。义素和语义特征这两个概念很相近,二者常混用,如黄伯荣、廖旭东对“义素”的定义是:“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所以又叫词的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见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但邵敬敏、周芍对二者作了细致的辨析,认为语义成分或者说义素是语义学术语,是对词的语义进行分析后得到的,而语义特征或者说义征是语法学术语,是指构成词义的若干义素中对形成某个句法结构起决定作用的义素,也就是两类不同聚合的词语在相同结构组合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意义上的特点,并从分析的对象、分析方法、各自的内涵、分析的目的等角度讨论了义素分析法与语义特征分析法的区别。见《语义特征的界定与提取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日]影山太郎著、于康等译《动词语义学——语言与认知的接点》,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用语义特征分析,主要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用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以独具某种特点,之所以能将该句法格式跟与之同形的句法格式加以分化的原因。”^①

正是看到汉语语义范畴(语义特征)和语法范畴(分布特征)存在一定的对应性,通过语法形式和意义的结合,马庆株(1981,1988)区分了动词的持续性与非持续性、自主与非自主两类重要的语义特征。其一,从带时量宾语的情况可以看出各类动词不同的语义特征,并概括为[完成][持续][状态]三项,例如,“死”:[+完成][-持续];“等”:[-完成][+持续];“看”:[+完成][+持续][-状态];“挂”:[+完成][+持续][+状态]。其二,根据功能和分布特征区分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前者的语义特征记作[+自主][动作];后者记作[-自主][变化]/[属性]。他认为从义素分析角度看,语义特征就是义素。^② 上述这些对动词语义的观察颇为深入,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具有启发性。

2. 配价和格语法

配价(valency)是指“句法成分相互之间可形成的各种联系的数目和类型”,“配价语法提供一个句子的模型,其中包含一个基本成分(一般是动词)和若干依附成分,依附成分的数目和类型由动词固有的配价权限决定”。^③可见,配价主要用来描述动词和名词性成分之间的组配关系,动词的“价”决定于动词所支配的不同性质的名词性词语的数目。一个动词能支配几个名词性成分,就说这个动词是几价动词。动词的价具有深厚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动词的支配能力是由动词的词汇意义所蕴涵的。^④

配价可以揭示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反映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但是,学界在配价这种范畴的性质、确定配价的标准、配价成分的语义角

^①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② 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7—180页。又载《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2页。

^③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7页。

^④ 参看袁毓林《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0页。不过,袁毓林也指出,动词的词汇意义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从动词的意义确定价缺少可操作的标准,而且动词的词汇意义对动词的句法分布的蕴涵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从动词的意义上不能准确地预测动词的支配能力和句法分布。